

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实 ——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

陈 长 文

笔者曾利用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会试录、同年录等原始文献对朱保炯、谢沛霖二先生编著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①（以下简称《索引》）做了一些校误^②。近来，在研究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索引》承袭了清李周望等编著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内附明代诸科，以下简称《碑录》）中一个较为严重的错误——把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赐特用出身科误作“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按：该科是“赐特用出身”，并非“赐进士出身”。严格意义上说这二百六十三人特用举贡，并非进士）。由于受《碑录》及《索引》的影响，致使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以讹传讹，一误再误。诸如《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中国历代选官制度》、《明代福建进士研究》、《明代浙江进士研究》等近期著作仍皆把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科，误作了“崇祯十五年壬午科”^③。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道光时修《钦定国子监志》的基础上进一步澄清这一历史事实，并以此为例就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问题简单地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索引》、《碑录》、方志等文献关于“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之讹误

《索引》下册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第2619—2621页为“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该科载“赐特用出身二

百六十三名 史惇、俞泰交……”等263人姓名。同样地,在《索引》正文中,史惇、俞泰交等263人都被载为“明崇祯十五年”。例如:史惇,《索引》第1809页:“(史)惇 直隶金坛○(应天府溧阳)明崇祯15特1”。再如俞泰交,《索引》第2301页:“(俞)泰交 直隶武进○(直隶无锡) 明崇祯15特2”。依此类推。我们知道,《索引》是《碑录》的索引化^④,那么《碑录》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碑录》题为“明崇祯十五年题名碑录 壬午科”,版心有“题名碑录、崇祯壬午”字样。该科首行大字题为“赐特用出身二百六十三名”,接之是“史惇,直隶镇江府金坛县籍,应天府溧阳县人;俞泰交,直隶常州府武进县籍,无锡县人;……”等依次为263人之名籍。

显然,《索引》未及详考,完全承袭了《碑录》的错误——把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科,视作“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

由于受《碑录》等的影响,许多清代所修的方志,也以讹传讹。兹举数例:

《浙江通志》(《四库全书》本)卷一三三《选举》十一《明·进士》:“崇祯十三年壬午特赐进士出身 王克家,钱塘人;……”崇祯十三年应为庚辰,而不是壬午(十五年)。

[光绪]《江西通志》(光绪刻本)卷二六《选举表》七《明进士》二:“……崇祯十五年壬午史惇榜特用出身 南昌府 姜赐履,南昌人。……谨案:……崇祯中赐特用出身进士,在题名碑(这里实指《碑录》)列十五年。旧志系之十三年,今改。”“旧志”,如乾隆时修《江西通志》原本是正确的^⑤,光绪年间重修时依据《碑录》却给改错了。

[同治]《饶州府志》卷十四《选举志》一《进士·明》:“崇祯十五年壬午特用进士出身 浮梁汪有润,字以德,静海知县,照《题名录》补。”^⑥[光绪]《吉安府志》也注明该科“《题名录》作十五年榜”^⑦。这里所言《题名录》即指《碑录》。

[光绪]《严州府志》卷十五《选举·明·进士》:“崇祯十五年特赐进士出身 吴志舜,王国材。”^⑧

[光绪]《抚州府志》卷四二《选举·明·进士》:“崇祯十三年庚辰赐史惇等特用出身 姚张澜,……;曾益,……;杨植纲,临川,云南籍。崇祯十五年特赐出身 曾撰,宜黄。”^⑨实际上,曾撰同上述三人一样也是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科,见特用题名碑。

此外,乾隆时修《钦定国子监志》卷四十八《金石》三《题名附·明》也这样误载:“(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赐魏藻德等二百九十六名及第出身题名碑,无记。十五年壬午科赐特用出身史惇、吴康侯等二百六十三名题名碑,大学士周延儒撰文,太仆寺少卿朱国诏书。”^⑩

《碑录》,顾名思义,应是对进士题名碑的抄录和整理。那么,该科题名碑又是怎样记载的呢?何以说它是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科,而不是“崇祯十五年壬午科”呢?

二、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题名碑及其他文献关于该科之记载

该题名碑碑额篆书“赐特用题名记”;碑身上端是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撰《赐特用题名记》碑文;碑身下半部分载:“赐特用出身二百六十三名 史惇,直隶金坛县籍,溧阳县人;俞泰交,直隶武进县籍,无锡县人……”等263人姓名、籍贯;碑末署“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立石,工部营缮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王灏监镌。”^⑪

周延儒在《赐特用题名记》中把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科的开科情况讲的非常清楚:“……我皇上于临御之十有三年,崇祯庚辰秋七月有特用举贡一事,岂非大生广生之德,符圣祖、轶百代者乎?伏读德音,首言‘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有以仰窥我皇上廑思于立贤无方之大道,盖已有年,而特于此二百六十三人之身一大行其湛恩汪濊,真如曜灵中天,得光如暖,……有簿敕,无私

与,乾元之生物间其不测者矣。然而,……若屡施格外之恩,则不测者(滋)成可测,而人萌侥幸,乃终之曰:‘此系特用,后不为例。’……臣又观诸臣合请谒庙、镌碑之奏,一禀高皇帝庙谟,盖亦仰窥我皇上□熙仪型之素,虽有创举,终归(旧)章,未尝以聪明或与其间。臣因是益□诸臣之恪奉……徇资格,今年不囿于资格矣。士希贤固其分内事,□□臣见贤思齐,无(添)先朝张□、杨士奇、夏原吉、海瑞……遗芳可乎?庙谟云:‘资格为……’有非常之品识,然后有非常之事功。庙谟云:‘有才能者不次用’,今事逢不次之用矣。……所用举人一百六十有三,贡百。……”

由以上碑文,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该科的开科时间是“我皇上于临御之十有三年,崇祯庚辰秋七月”;而该特用出身科题名碑的立碑时间为“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立石”。《碑录》作者只看到碑末所署“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立石”一行,不详考碑文,便妄下断语,认定它为“崇祯十五年壬午科”,显然是错误的。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该科的文献记载可为佐证。谈迁《国榷》载:“(庚辰崇祯十三年四月)丙寅,谕吏部曰:‘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⑫这道上谕正好与题名碑中“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此系特用,后不为例”等记载相吻合。《国榷》又载:“(崇祯十三年五月)丁酉,特授岁贡生史惇、俞泰交、章晋锡、陆禹思、张奕颖、王榜、陈兆珂、陈兴言、徐有声俱户部主事;吴康侯,礼部主事;……(八月)丙寅,户部主事史惇等请岁贡生谒太学立石,许之。”^⑬这些记载可与特用题名碑互为印证。

其实,早在道光时修的《钦定国子监志》一书中业已把致讹原因讲得非常清楚:“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赐魏藻德等二百九十六名及第出身题名牌,……又赐史惇等一百六十三名、吴康侯等一百名

特用出身题名碑，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撰记，奉政大夫、太仆寺少卿兼翰林院侍书朱国诏书，工部营缮司主事王灏监镌，十五年九月（当为七月）立。……谨案：……其庚辰特用一碑，旧时以碑末有‘崇祯十五年七月’一行，因讹作‘十五年壬午科’。高承埏《鸿一亭笔记》云：‘崇祯十三年，拔下第举人史惇等廷试，贡生吴康侯等俱留特用，授主事、知州、推官、知县有差。’又史惇《杂记》云：‘崇祯庚辰，上有厌薄进士之意，故将下第举人与廷试贡生尽留特用。惇等请援进士例，谒文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阁臣张四知以为不可，上命如所请，立石国学。’”^⑭它明确指出：“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乃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科（1640）之讹；致讹原因是把‘崇祯十五年七月’这一立碑年月误作了开科年月。该书考证谨严，可以说一扫既往舛讹。但惜其流传不广，远没有《碑录》影响那样深远，所以后世依旧以讹传讹。同、光时所修方志的讹误即是明证。这样的讹误，牵连到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

三、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上的滞后性及方式上的集中性

经过对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的立石情况考察研究，笔者发现：在立石时间上，只有少数明代进士题名碑是在殿试后当年建成的；相反，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殿试后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补建的。朱彝尊也曾慨叹：“（明代）进士题名，其初，释褐后即撰记立石，后乃有迟之一二十年始立石者，……士大夫论资格日严，而忽视题名如此，良可叹也。”^⑮更有甚者，如永乐十年（1412）进士题名碑，正统九年（1444）十月方才补立，此时已距殿试近33年，历跨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题名碑，天启三年（1623）补立，历时34年；万历十四年进士题名碑，历时37年；万历八年（1580）进士题名碑，天启三年（1623）补立，历时43年^⑰。这样长的时间间隔，在当时势必减弱了进士题名

碑的严肃性、准确性和现实性,因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其文献价值也会打些折扣。

此外,在立石方式上,并不像明前期一科一立,到了中后期多是若干科进士题名碑,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集中、同时补立的。清初李周望在《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中说:“太学题名碑记,元仅有存者;明代石刻,旋缺旋补。”^⑩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正德六年以后若干科,在嘉靖初补立;嘉靖十四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五科在嘉靖三十年一齐补立;万历八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四十七年共十一科,均在天启三年由工部监督主事王振奇监立;崇祯元年、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十三年特用科六榜均在崇祯十五年由工部署郎中事主事王灏监镌^⑪。这种立碑的方式,可以说完全背离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进士题名碑的初衷,徒事敷衍而已。试想,十几科题名碑,进士多达三、四千人,要将其姓名、籍贯一一勒之于石,其工程是浩大的,仓猝之间,出错亦是难免的。

综上所述,《碑录》、《索引》及方志等文献所言“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纯属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科(1640)之讹误。致讹原因是把‘崇祯十五年七月’这一立碑年月误作了开科年月。而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上的滞后性及方式上的集中性又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认为,作为我国明代科举制度珍贵的文物史料的进士题名碑,有着其他历史文献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鉴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诸多局限性,在治学过程中,凡牵涉到明代的科举与进士,不能仅以进士题名碑、《碑录》及《索引》为据,应当充分利用明代的进士登科录、会试录、同年录等原始文献及(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此外还有大量的明代方志、笔记、文集等诸多文献资料进行共证、互证,惟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

注:

①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陈长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3—16页。

③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四卷《明代》,吴宣德著,第七章《明代的科举制度》表8《明代历届科举进士人数表》,491页。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十章《明代——科举制的鼎盛时期》,324页。多洛肯:《明代福建进士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附录》一,226页。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附录》,397页。

④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前言》:“……为此,把清乾隆十一年(1746)所刊行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及其所附刊明代诸科,以《进士题名碑》的拓片、《登科录》、各省方志等校订增补,重行汇辑,并加以索引化,供检索者利用,以节约时间和精力。”

⑤《江西通志》,《四库全书》本,第514册,823页,卷五五《选举》七《明》:“崇祯十三年庚辰赐史惇等特用出身 按:是科特用江西四十名,……共二百六十三名,内举人一百六十三名,岁贡生一百名。”

⑥[同治]《饶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9册,393页,卷十四《选举志》一《进士·明》。

⑦[光绪]《吉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60册,701页,卷二一《选举志·进士》:“崇祯十三年庚辰赐史惇等特用出身 案:……《题名录》作十五年榜,《通志》作十三年榜。”它采用了《通志》的观点,并存疑。它所言“《题名录》”指得就是《碑录》。

⑧[光绪]《严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8册,321页,卷十五《选举·明·进士》。

⑨[光绪]《抚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46册,38页,卷四二《选举·明·进士》。

⑩(清)梁国治等:《钦定国子监志》,《四库全书》本,第600册,539页,卷四十八,《金石》三《题名附·明》。

⑪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

籍出版社,1989年,第60册,119页。

⑫谈迁:《国榷》卷九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5862页。

⑬谈迁:《国榷》卷九十七,第5865、5874页。

⑭(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六二《金石志》十《进士题名碑·明》,第1126页。按:高承埏,崇祯十三年庚辰科第三甲进士;史惇,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科第一名,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他们的记载当是可信的。

⑮(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六七《官署》,第1110页。

⑯《明英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卷一二二,正统九年十月丁未条。

⑰(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卷六二《金石志》十《进士题名碑·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册,第149页、173页。笔者并就碑文进行了考证。

⑱(清)李周望等:《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清光绪刻本。

⑲主要利用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60册中明代七十一通进士题名碑的拓本;(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六二《金石志》十《进士题名碑·明》。笔者并就碑文进行了考证。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